

1509

即墨市



即墨文史资料

第九辑



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即墨文史资料

第九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 忆在即墨抗日根据地的岁月……胡晓光(1)
- 大沽河畔备战洞……胡晓光(37)
- 简忆擲城区武工队……李安世 王道珣口述
王本安 整理(45)
- 漫忆井山武工队……姜纯玉 周尊宜口述
毛宗兴 整理(56)
- 毛主席赠我“十发步”
……张敦仁口述 毛宗兴整理(94)
- 即墨姜第一座变电站及第一条 35 千伏输电
线路……张 波(105)
- 李毓昌命案审理原委追述……于保业(111)
- 黄培文字狱始末……石业华(125)

追述丈儿山庙会

.....马兆基 崔希珊 孟吉方口述

徐德谊 整理(155)

龙塘埠大庙考.....徐伦成(163)

即墨乡间的基督教堂概况

.....高祖善 孙泉声 郭广欣(171)

抗战回忆录(下).....隋永喆(179)

忆在即墨抗日根据地的岁月

胡晓光

即墨抗日根据地建立之际，也是我应党之召参加革命之时。1942年夏至1945年日寇投降的整整三年中，我一直战斗和工作在即墨西北边区这块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上。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我的斗志，战斗的洗礼强化了我的胆略，战友的鲜血染红了我的心灵，根据地的人民哺育着我成长。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所经历的一些往事，有的已如烟云，印象模糊；有的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现将所能记忆者录之如后，以飨读者。

一、恶劣的斗争环境

1941年冬和1942年春期间，由于日寇搞强化治安，国民党搞二次反共高潮，再加之我党内出现叛徒，我即墨地下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为应付对敌斗争局面，我即墨县委在朱家庄秘密组织起数十人的“胶即游击队”同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同年7月，我胶东军区和南海军分区主力部队赴即作战，经移风店、荒洼、冷家埠、程戈庄等战斗，将国民党山东保安一旅的一、三团孙可佩、管明斋等顽军赶出了七、八区。同时，在主力部队的支持和补充下，我胶即游击队已扩充至近二百人，被命名为“南海独立营”，不久又改为“即墨县大队”，正式成为我即墨县的主力武装部队。9月初，我党在堤前村成立了“三三制”的即墨县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了东八区、西八区、东七区、西七区区公所和堤前、家西、马军寨、张家、付家、朱家庄等20余村的村政权，从而奠定了我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此时，我能控制

和公开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原八区的西半部和原七区的西北部，东西宽约 20 华里，南北长约 40 华里，包括约 90 个村庄。根据地刚刚建立，人民群众饥寒交迫，我们这支身单力薄的年轻武装处处遭到敌人的扫荡围迫，可想而知，其斗争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面对两个敌人 在这块范围不大的根据地里，三年来，我们一直要对付着两个凶恶的敌人。一个是日伪军。根据地四周的刘家庄、南村、沙梁、蓝村、南泉、长直、灵山等村镇都设立了日伪据点，除对根据地骚扰外，还经常对当地人民实行烧杀抢掠，搅得民不聊生。我根据地建立半年后，日伪又在我腹地移风店村安设了据点，活动益加频繁猖獗。他们或单独或联合，或与青、即大股日伪军一起轮番向我进攻扫荡，合围我部队，扑杀我地方党政人员，并收买汉奸特务散布谣言，威胁恫吓群众不准与我接触，不准供我食物，甚至为此而搞

了保甲连坐，恨不能将我新生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另一个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我们称之为投降派的隋永谥部队及其区乡武装，他们同日寇一样，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对我虎视眈眈，或大股或小股，或公开或秘密，不时地向我进攻或偷袭，并派间谍刺探我军情，策反我战士，甚至与日伪勾结配合对我进行夹击。那时，我们所处的环境，经常是日伪刚走，顽军又来，或者是日伪在东村扫荡，顽军在西村抢粮。

被迫化名改装 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仅有一、二百人的县大队，不得不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与敌周旋。或在根据地内隐蔽休整，或化整为零分散潜伏于敌控区，寻机打击敌区的小股之敌，镇压汉奸和伪村、乡政权等。而每当此时，我分散在各村工作的党政人员则增加了更大困难。为了在活动中同敌相遇不被识破是“八

路”，其穿着打扮必须与当地群众相同。为此，当时很多同志故意将新发的棉衣弄脏搞旧，或用新棉衣换群众的破旧棉袄穿。吴善堂、马金铭、崔景岚等县委领导同志都这样做过，我也曾请房东老大娘在我的新棉裤上故意用破布补上了几个补丁，以减少敌疑。当时我才十七、八岁，故意做了付弹弓带在身上，以便在敌人盘查搜身时假称是某村的“学生”。此举还真奏效，有好几次竟以此瞒过了敌人。为了万一被敌人捕去时不至于牵连家庭亲人，当时同志们多用化名，家庭住址也从不实说。当时我的化名叫“隋斌”，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泉上村人。

日夜警惕防敌情 当时敌人的活动规律，日伪军一般是在白天活动，而国民党土顽则除白天外还常于夜间来我根据地内偷袭破坏。因此，我地方工作人员昼夜活动都必须提高警惕，头脑中防敌情的弦一刻也松不得。为

防奸特告密，我们经常是今日驻东村，明日马上转西村，有时上午驻这村，下午突然驻那村，上半夜在这村工作，下半夜则移至另村住宿，并且这些行动都是临时决定，生怕发生意外。在获悉各村能有敌情时，还常于深夜趟水踏冰到大沽河北岸的韩家疃、余家疃、沙窝等“后方”村过夜。有时刚摸过河又得知这里也有敌情，便不得不急速返回另找住处。1942年底日寇大扫荡，我曾随马金铭、朱培锡等人在发现敌情的情况下，夜行数十里到边沿地区的毛子埠、大欧戈庄等村的地下关系户家隐蔽过。是年冬，我与胡耕民曾夜行五十里潜回泉上村家中隐蔽过。

当时是“拉锯”形势，敌我双方活动都很频繁。所以，白天黑夜走路或进村都随时可能与敌遭遇。进村前，先要在村外向群众了解村内有无“情况”，以免冒然而人与敌遭遇。此类教训发生过多次，如李中杰、苗田锋、江文秀

等不少同志都曾因此而与敌人交火,有的被群众掩护脱险,有的则被敌人捕去。1944年秋的一个下午,我独自由马龙疃去徐家沟,刚进入一条胡同,才知国民党区队正在村内逼款催粮,在已来不及出村的情况下,幸亏村民徐国山将我掩藏在他家的磨盘后才得以脱身。是年夏,胡耕民去毛公泊,被已在村内的日伪军追出老远,跑丢了手枪,为此曾受过组织处分。1945年春,马骥和于忠同志也是在追种情况下进古城村时被刘家庄的日伪军捕杀的。夜间行路要随时注意前后左右有无敌情。姜厚向同志就是夜间在去毛家岭的途中同敌遭遇被杀害的。1943年春的一个黑夜,我随马金铭由韩家疃过河去沙埠活动,刚出树林至马军寨村边时,影影绰绰见路追上有黑压压的一些坐着和躺着的队伍,当时也看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又不敢问。我俩便悄悄地走到跟前,当从这些东倒西歪的人群空

隙中穿过时，发现他们穿着大皮靴，附近还有日本大洋马，这时才知道我们走进了去根据地扫荡在此休息的日寇人群中，心里真捏着一把汗！幸亏是黑夜，敌人看不清，或误认为是自己人。事后谈起仍觉后怕，正如吴善堂同志说我俩是“摸了一下阎王鼻子”。

家常便饭“躲拂晓” 日伪军袭击我的规律，除在大扫荡时集中大批人马用拉网梳篦战术向我进攻外，另一个惯用伎俩就是于拂晓前正当人们熟睡时，对我常驻之村庄进行突然包围，逐户搜捕，或将村民赶往一处，威逼群众供认“八路”。为此，我党政人员经常不顾天寒地冻和酷暑盛夏，天不明就得起来溜到村外找一隐身处观察敌情。待天大亮后，如无敌情则回村吃饭工作，如有情况就得立即转移。当时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躲拂晓”，在那年代，“躲拂晓”几乎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为了防敌情，晚上我们都是合衣而睡，加

上没有内衣可换，当时每人身上都生有大堆虱子，有的还长有疥疮。本来工作到半夜才能睡觉，再加上天气冷、虱子拱、疥疮痒，乍躺下根本睡不着，刚入睡不久又要起来“躲拂晓”。记得有一次我与周尊宜在某村过夜，因实在大困懒得起床，周得我硬拽了起来拉到了村外。天寒地冻，睡梦正香，突然搅醒真不是滋味。

夏秋季节，虽然青纱帐是我们的天下，但仍然要“躲拂晓”。为了减少麻烦，大家有时半夜工作完后，干脆到村外找一安全地方睡，如有敌情转移也方便。数年中，我先后曾与徐晓风等在大吕戈庄村西的树林里，与李明德、王宦承在家西村后的沙滩上，与孙克环在徐家沟村南的看瓜棚里，与王绍亭在西七级村东的场园屋里，与马全铭在古城村南的高粱地等处过过夜。在情况紧急时，夜间曾与女同志在堤前村后密林内，在三湾庄西的苇丛内躲

过身，那里还顾得上男女之嫌！夏天在外边过夜，虽无天冷问题，但却受不了蚊虫叮咬和露打雨淋之苦。不过有时也可领略到仰观满天星斗静听蛙蟋合奏之乐。

三年中，大家虽都在各方面提高警惕，但由于日伪和土顽的活动频繁而猖獗，加之我地方工作人员是分散在各村单独活动，所以仍有不少同志不幸落入敌人之手。就我所能记忆的（不包括在边沿区对敌斗争的各区队和武工队），如 1942 年秋马金铭、姜厚向，1943 年春、秋于宝光、于克本、江文秀，1944 年春朱思雨、杨乃省，1945 年春马骥、于忠等同志就是因此而被捕的。这些同志，除马金铭、于克本、江文秀、朱思雨四同志被捕后设法脱险外，其余同志全被敌人杀害。正如当时有的同志所说的：“脑袋拴在裤带上，随时都有丢掉之危”。

二、艰苦的物质条件

当时的根据地，斗争环境如此恶劣，而物质条件更为艰辛。原先，该地区同其它敌占区一样，经数年来日伪军的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的勒索搜刮，当地群众生活相当贫苦，有的可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求生存，不少民众流落他乡。我党来此建立抗日根据地，当然不能再加重人民负担。这就要求我党政军人员在生活上节衣缩食，俭朴从事，与人民同甘共苦，其物质条件可说是捉襟见肘。

微薄的供给制 当时上级规定党政军人员的生活待遇一律按供给制。其标准是：每人每日一斤粮，五钱油，五钱盐，一斤青菜（当时为十六两称），粮发粮票，油、盐、菜按市价折菜金发给；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每季度发一双鞋。部队一般是发实物，地方人员一般是发现金，有时也发布由个人

设法缝做。此外，每人每月发津贴费一元，县营级干部发一元五角。部队吃饭一般是集体起灶，地方工作人员大都是在所在工作的村庄的群众家吃“派饭”，按顿付给粮票菜金。在集中开会或逢年过节时，也偶尔大家动手开伙做几顿吃，借以改善一下生活。

当时，对吃“派饭”者有条规定：群众吃什么你吃什么，谁也不许搞特殊，不准向群众提吃什么的要求，不得超过群众平常的生活水平；吃饭后要付粮票菜金，一时无有者要打欠条。那时大家都正年轻力壮，活动又多，饭量也大，一斤粮分三餐吃实在不够。要想吃饱，供饭者是要吃亏的，看看群众的困难境况，也实在不忍心多吃。有时见饭已吃光也不好意思再要，只有忍饥说吃饱了。吃不饱，嘴就馋，但又无钱买别的吃。记得当时每月一元钱的津贴费只值三斤炒花生的价格，何况还得买毛巾、肥皂等用品。会吸烟的同志还得用来买

点烟叶抽，好在那时大家多无每天刷牙的习惯，否则连牙刷牙粉都买不起。县邮局的孙智贤和袁子仁，因无钱买烟叶曾经吸过豆叶；1943年春的一天，我和朱培雨、高惠连实在靠极了，吃饭时竟用饼子把点灯用的花生油从灯碗里蘸着吃光，结果夜间只得摸黑开会。那时节，同志们的手头尽管攥的很紧，一年到头却仍然囊空如洗。

萧条贫乏的集市 敌人为了扼杀我们，除在军事上攻击外，还千方百计地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严禁各类商贩到我控制区卖东西。所以，当时我根据地内仅有的几个逢集的村庄——移风店、东七级、西七级、付家等集市上，商品寥寥无几，生意极为萧条。除一些农产品外，日用百货极少，如布匹、鞋帽、纸张、毛巾、牙刷、煤油、火柴等物品几乎全无，不要说我们无钱买，就是有钱也无货可买。好在当地农民多能自己纺线织布，大院等